

# 附录 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年代学研究评述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裴维英（越南） 郑君雷

船棺葬是东山文化居民适应水泽环境的一种埋葬习俗，越南学者很重视。由于东山文化与中国云南、岭南乃至百越地区存在交流，尤其是东山船棺葬与巴蜀船棺葬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中国学者也很关注。本文以裴维英硕士学位论文<sup>[1]</sup>的相关认识为基础，主要对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分期编年研究作评述介绍。

## 一、东山文化船棺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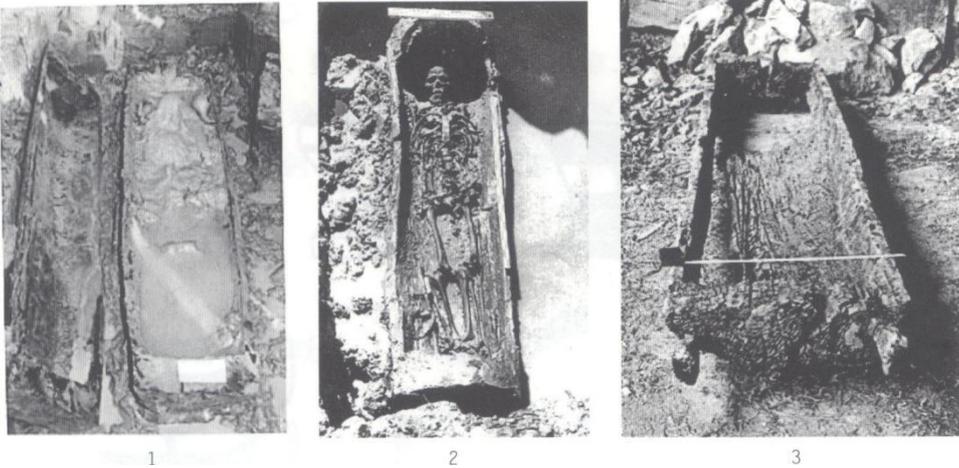
东山文化分布在越南北部和北中部地区，越南学者多赞同划分为三个地方类型，即红河类型（塘瞿类型）、马江类型（东山类型）、嘎江类型（郎洼类型）<sup>[2]</sup>，船棺葬均属于红河类型。船棺葬只是越南东山文化葬俗中的一种，分布于红河平原低地，在河内市西南部与河南省西北部的红河流域、底江流域，以及兴安、海阳、海防、广宁等省的太平河冲积平原至沿海地带发现 38 处墓群 160 余座墓（表一）。

表一 东山文化船棺葬分布统计表

地点	墓地数量	墓地名称
河内市	14 处	青威县：富梁、富览 应和县：铜龙、芳秀、沉珑墓地群、金堂、明德 富川县：周贛、俩芳、春罗 常信县：铜陵、胜利 清池县：月昂 慈廉郡：苏江
河南省	8 处	金榜县：周山、青山 维仙县：安慈、督官、堆山、秀村、安北、仙内
兴安省	2 处	金侗县：洞舍、恩施
海阳省	6 处	南策县：罗堆 荆门县：义武、慈乐、武舍 嘉禄县：东关 志玲县：杰尚
海防省	6 处	水源县：越溪、寨山、水山、中和、甸城山 先浪县：决进
广宁省	2 处	汪秘市：南方、东方

东山文化船棺葬（图一、图二）绝大多数是在土圻内放置船棺，有些使用木桩、竹竿支撑加固（图三），个别在木椁或砖室内放置船棺。船棺的制作方式是将原木剖为两半，分别剜凿成凹槽状的棺盖和棺室，形似船舱；棺盖、棺室有些是将原木中心挖空成独木舟状，有些是整条挖通，两端各自插立半圆形挡板；棺盖与棺体的扣合处四

周起槽以子母口套合，或者施钉，或者用绳子捆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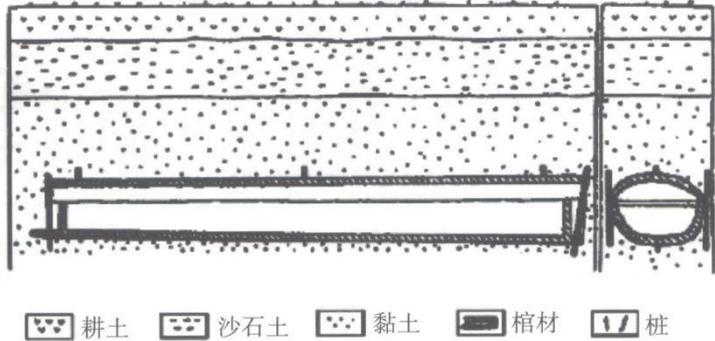


1. 河南省安北船棺      2. 河内市周赣船棺      3. 海防省寨山船棺

图一 东山文化船棺葬



图二 海防省越溪 M2 船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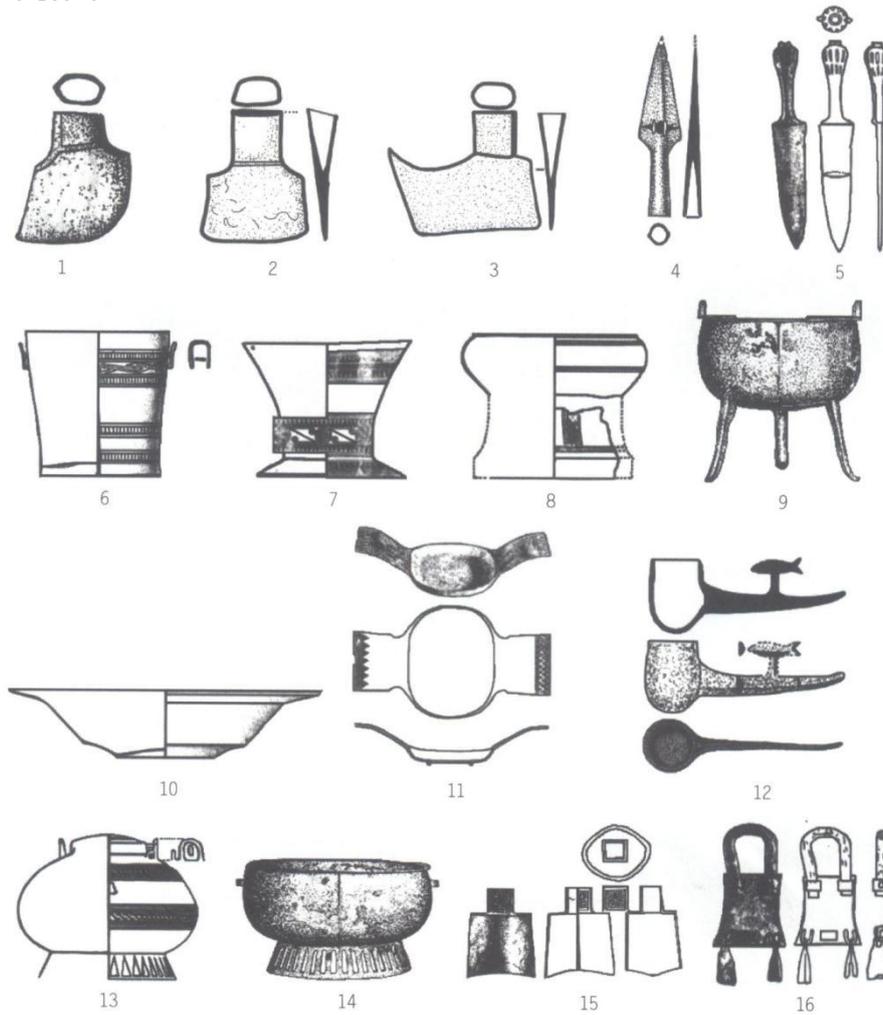
图三 海防省越溪 M2 船棺剖面图<sup>[3]</sup>

船棺葬出有青铜器、陶器、竹木器（包括漆器）、铁器、石器、玻璃、玉石等器物。

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有武器、容器、生产工具、乐器、装饰品、杂器等（图四）。包括斧、钺、矛、短剑、镞、护胸甲片等兵器，提筒、盅、勺、越式鼎、壶、盆、罐、盘、碟和簋、匜、樽等容器，凿、削、刮刀、锉刀、卷刃器等生产工具，鼓、铎、钟、铃等乐器，装饰品主要是手镯、耳环，杂器有带钩、铜钱等。在船棺葬中，不对称形铜钺、铜提筒、铜盅、铜鼓是东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提筒、盅、勺等有些是青铜明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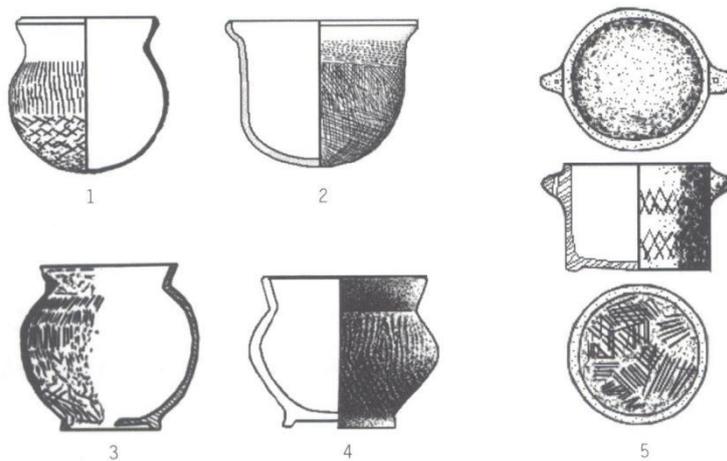
出土陶器（图五）基本是实用器具。有泥质陶和夹砂陶，陶胎多呈灰色、红色、红褐色，部分陶器胎质粗糙，火候较低，见有硬陶。陶器种类有釜、罐、壶、碗等，纹饰多见绳纹、弦纹、方格纹、菱格纹等。

船棺葬出土漆木器的种类、数量均较丰富，包括木碟、木碗、木枕头、木梳、木锄、木浆板、木雕人像等，以及工具、武器的木柄，漆器制品主要是出土于周赣 2000M1 的汉式漆案、漆耳杯、漆盘等。船棺葬出有剑、锄、斧等少量铁器，玉石器类主要是手镯、耳环，玻璃器多为装饰品。



1、2. 斧 3. 钺 4. 矛 5. 短剑 6. 提筒 7. 盂 8. 鼓 9. 鼎 10. 盆 11. 盘 12. 勺 13. 壶 14. 篮 15. 铎  
16. 铃 (1. 罗堆 64LDM2 2. 富梁 H4M1 3. 富梁 84H1M5 4. 安北 M7 5、7~9、11、13~16. 越溪 M2 6. 安北 M1 10. 周赣 2000CCM1 12. 富梁 H2M2)

图四 东山文化船棺葬出土铜器



1、2. 釜 3、4. 罐 5. 卮形器 (1. 周赣 74M7 2. 周赣 2000M2 3. 春罗墓地 4. 罗堆 64LDM2 5. 富梁 H1M5)

图五 东山文化船棺葬出土陶器

## 二、东山文化船棺葬研究概述

法属时期东山文化船棺葬已经有少量发现。据《越南东山文化船棺葬》[4]介绍,越南学者对于船棺葬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1-1974年)。1961年发掘的海防省越溪墓地是越南学者首次发掘的东山船棺葬,当时即引起学者们的关注;1962年、1963年又发现了海阳省罗堆、义武船棺墓地。1965年出版的《越南历史博物馆藏越溪古墓的一批遗物》[5]开启了东山文化船棺葬研究的新阶段。1974年发掘的河西省周贛墓地为船棺葬研究提供了体质人类学材料。

第二阶段(1975-1984年)连续发现、发掘一批船棺葬,主要包括越南河南省的周山、青山、安慈、堆山墓地,河内市的苏江墓地,河山平省的铜龙、春罗墓地,河西省的富梁、芳秀墓地等,船棺葬研究开始深入。

杜文宁1977年最早对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年代问题进行讨论。他根据越溪、寨山、罗堆、义武等墓地材料,认为越南北部船棺葬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3世纪,并指出“船棺葬”与较晚出现的“砖室墓”两套墓葬体系存在着相互影响<sup>[6]</sup>。

1978年,范国君提出以越溪、义武及周贛墓地为代表的东山文化船棺葬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以罗堆、周山墓地为代表的船棺葬年代为公元1至3世纪,认为东山船棺葬后期受到了汉文化影响,但是继续得以发展<sup>[7]</sup>。1981年,范国君根据周山墓地材料,认为东山船棺葬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6~7世纪<sup>[8]</sup>。

1981年,越南考古学院与丹麦学者联合开展船棺葬发掘,丹麦考古学家佩尔·素伦森根据与泰国、东南亚及中国四川地区船棺葬资料的比较研究,提出越南北部船棺葬的编年框架为公元前450年至公元220年<sup>[9]</sup>。

1982年,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第一届船棺葬研究会议,研讨领域包括船棺葬的命名、分布范围、类型及编年等,郑根、黄春征等还对船棺形制、随葬器物以及东山文化的扩展、社会发展阶段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三阶段(1985年至今)继续有河内市富梁、金堂、明德,河南省安慈,广宁省南方等船棺墓地的发掘,调查清理了河内市沉珑、铜陵、月昂,广宁省东方,海防省决进等船棺墓地。此阶段对于船棺葬的研究扩展到越南周边地区,开始关注船棺葬的起源、传播路线、文化内涵等方面。

1986年,裴文廉提出船棺葬的文化特征属于塘瞿类型(即红河类型),塘瞿类型居民是船棺葬的创造者<sup>[10]</sup>。1987年裴文廉将越南船棺葬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东山文化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2世纪),第二阶段为公元3世纪

至今<sup>[11]</sup>。

1985年，范国君结合东山居民的生活环境及越南、东南亚等地的民族志材料，提出船棺葬白百越民族向周边传播的观点<sup>[12]</sup>。在1986年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科学通报会议上，陶贵景对“树木挖空的棺材墓葬”的类型演变进行了讨论，认为越南此类墓葬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其传播路线是从海岛东南亚进入越南再扩展至华南地区<sup>[13]</sup>。根据碳-14测年数据，潘进波等于1986年提出周贛墓地在越南船棺葬的编年体系中最早，认为越南船棺葬起源于公元前4世纪<sup>[14]</sup>。

1994年，何文璠根据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分布范围、自然环境，结合东南亚考古遗存中的舟船形象，提出船棺葬的起源与舟船作为送达死者灵魂的工具有关，认为舟船在当时具有重要象征意义<sup>[15]</sup>。

2013年，裴文廉出版《越南东山船棺葬》<sup>[16]</sup>，这部专著全面收集了东山文化的船棺葬材料和碳-14测年数据，还包括东山文化之后历史时期乃至近现代的船棺葬资料，对越南船棺葬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讨论，为更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 三、关于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分期编年

东山文化处在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过渡时期，越南学者一般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公元前800年—公元前700年）是前东山文化向东山文化的演变阶段，首先出现红河类型；中期（典型期，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00年）为东山文化的发展期、高峰期阶段，船棺葬在此阶段出现，与东山居民大规模南下占据红河平原有关<sup>[17]</sup>；东山文化晚期（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00年）受到汉文化和沙莹文化的影响，船棺葬更加流行。

在1982年“第一届越南船棺葬研究会议”上，郑根<sup>[18]</sup>将东山文化船棺葬划分为初始期、兴盛期和衰落期，认为兴盛期的船棺两端保留原木作为挡板。黄春征<sup>[19]</sup>将越南北部地区东山文化的船棺葬分为三期，认为第一期东山文化船棺分为棺盖、棺体部分；第二期东山文化的船棺分为棺盖、棺体及挡板部分；第三期为东山文化之后至今的船棺葬。

裴文廉的分期比较有影响性<sup>[20]</sup>。早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以越溪、周贛、侏芳、寨山等墓地为代表，土坑墓圻，船棺横截面为圆形、近圆形，两端保留原木或插立挡板，主要随葬东山文化典型青铜器；中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以富梁、芳秀、金堂等墓地为代表，土坑墓圻，船棺横截面为圆形，出现铜器、漆器等汉式器物；晚期（主体年代为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以春罗、安慈、洞舍等墓地为代表，船棺横截面为六角形，随葬品以包括漆器在内的竹木器为主，东山文化青铜器明器化，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器物明显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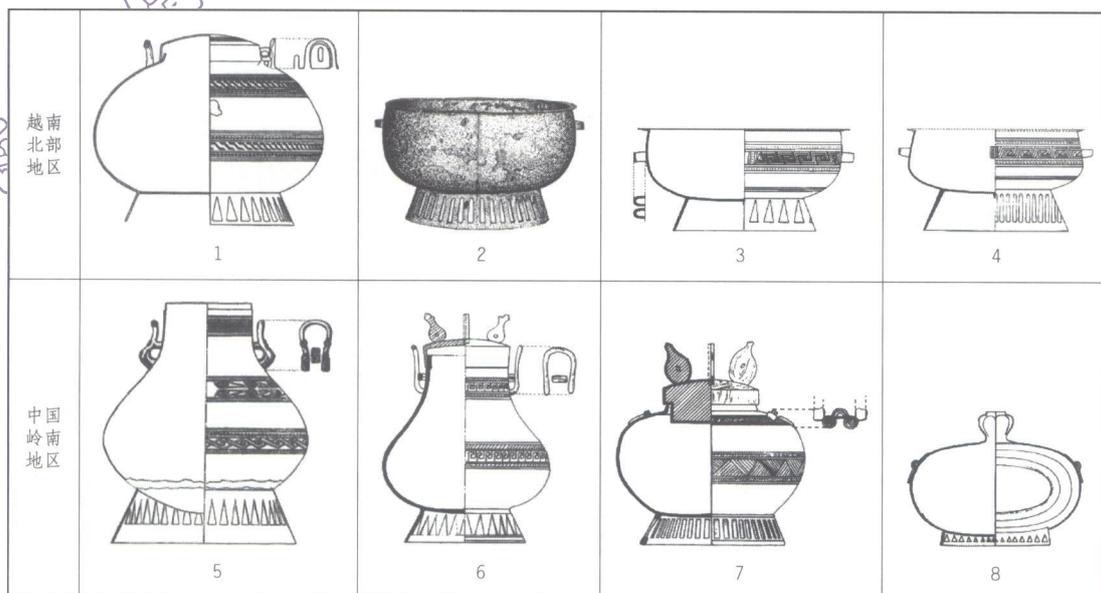
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发现研究已经近 80 年，但是分期编年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原因首先是对于东山文化年代框架、发展阶段等方面的认识有限，其次是经过科学发掘、记录的船棺葬数量不多，此外出土器物不丰富，致使船棺葬分期编年的依据不充分。

中国学者对于东山文化年代上限的看法较越南学者偏晚。王大道通过与云南青铜文化的比较，认为东山文化年代在公元前 5 世纪—公元 1 世纪之间<sup>[21]</sup>；林永昌从与滇文化青铜器比较的角度，认为上限约在公元前 4 世纪—公元前 3 世纪之间<sup>[22]</sup>；李龙章则认为东山文化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早期<sup>[23]</sup>。东山文化的结束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公元 1 世纪，以马援征伐二征（公元 43 年）为标志性事件，不过在其后的一二百年还见有东山文化因素的遗留。

船棺葬的分期编年必然要依托于东山文化尤其是红河类型的年代框架。范明玄认为东山文化各类型的形成时间和背景不同，而且文化发展阶段不同步，至东山文化晚期各类型的文化面貌方趋于一致<sup>[24]</sup>。在何文璠的编年框架中，红河类型的早期阶段为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700 年，典型期阶段为公元前 700 年—公元前 200 年，晚期阶段为公元前 200 年—公元 200 年<sup>[25]</sup>。还要考虑西汉交趾郡设置（公元前 111 年）后，东山船棺葬与越南北部汉墓有着至少一二百年的并行期。

船棺葬的分期编年应该建立在船棺形制、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研究基础上。东山船棺大都填埋在形制简单的土圻内，而且一些船棺葬未经过科学发掘或保存不佳。随葬器物的编年研究也受到客观条件限制，如陶器种类单调、数量少（出土陶釜、陶罐仅近 20 件）；铜器不丰富且铜器断代有其特殊性<sup>[26]</sup>，漆木器、铁器形制较单一等。而科技手段测年取决于样本和测年方法的可靠性，船棺葬可能“存在使用较早砍下木材情况”，林永昌即怀疑“存在其他未被注意的客观因素”而导致东山文化的碳-14 数据整体偏早<sup>[27]</sup>。

海防省越溪 M2 的年代争议，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船棺葬年代研究的复杂性。越溪 M2 出有 100 余件器物，主要是东山文化典型青铜器和一批受到吴越、百越文化影响的青铜器，还有少量漆木器，没有陶器。越溪 M2 出土铜器“处于越南青铜时代的衰落阶段”，曾经被认为是东山文化最早的船棺葬，年代为公元前 4 世纪—公元前 3 世纪<sup>[28]</sup>。越溪 M2 是船棺葬分期编年的重要参照点，裴文廉后来根据碳-14 测年推断在公元前 6 世纪—公元前 4 世纪<sup>[29]</sup>；其后德国学者雷安迪重新取船棺炭样测年，认为年代在公元前 250 年—公元前 150 年之间<sup>[30]</sup>。从器物形制出发，蒋廷瑜推测此类圈足铜壶为南越国器物，年代为公元前 2 世纪<sup>[31]</sup>；韦伟燕通过对铜壶、铜簋圈足形制的比较，认为年代为秦末至西汉初年（图六）<sup>[32]</sup>；李龙章指出该墓部分青铜器与岭南地区西汉墓相似，认为“起码应断在西汉时期，很可能就是西汉中晚期墓葬”<sup>[33]</sup>。



1、5、6. 铜壶 2、3、4. 铜簋 7. 铜甗 8. 铜扁壶 (1、2. 越溪 M2 3. 义安鼎村 1973H2M14: 11  
4. 义安鼎村 1972-2541/11 5. 广州汉墓 M1180: 44 6、7. 广州瑶台 M11 8. 广西贵县罗泊湾 M11: 17)

图六 越南北部和中国岭南圈足铜器对比 (引自韦伟燕文)

#### 四、东山文化船棺的类型划分

在船棺葬的分期编年研究中，船棺形制亦受到重视。

东山船棺长多在 2~3 米之间，宽多在 0.4~0.7 米之间，有些船棺两端宽窄略有差别。越溪 M2 船棺长 4.6 米；慈乐 M1 船棺长 4.75 米，两端分别宽 0.84 米和 0.76 米，形体较大。棺盖、棺体的形制大体对称，有的棺盖较小，棺盖出土时已多有损毁。据报道，武舍船棺有 3 个舱室，其中 2 个放置器物，1 个放置尸体，较为特殊。

越南学者对于船棺形制的观察点首先是首、尾结构，即保留原木作为挡板还是插立半圆形挡板（厚度多在 10~20 厘米之间）；其次是原木外表的加工程度，有些船棺外表尚有树皮，基本保留原木形状的船棺横截面多为圆形，外表加工较多的船棺横截面呈六角形、八角形；此外是挡板外侧鳌柄的数量、形状（槓状鳌柄一般长 10 余厘米）。

船棺的类型划分意见也不统一。结合介绍材料，本文首先根据挡板结构，将东山船棺划分为甲（原木挡板）、乙（插立挡板）两个系统，然后根据船棺横截面形状、挡板外侧鳌柄等情况划分型和亚型。本文的类型划分只是“分类学”意义上的，因为现有材料不足以进行类型学研究<sup>[34]</sup>，这也是没有使用“式”这一概念的原因。

甲系统 船棺的首、尾两端或一端保留原木作为挡板，分为 A、B 两型。

A 型：仅挖空原木中心，两端保留原木作为挡板，挡板外侧无鳌柄。

Aa 型：基本保留原木外表，横截面呈圆形、椭圆形。如周赣 2000CHCM3（图七:1）、安北 2000YBM3（图七: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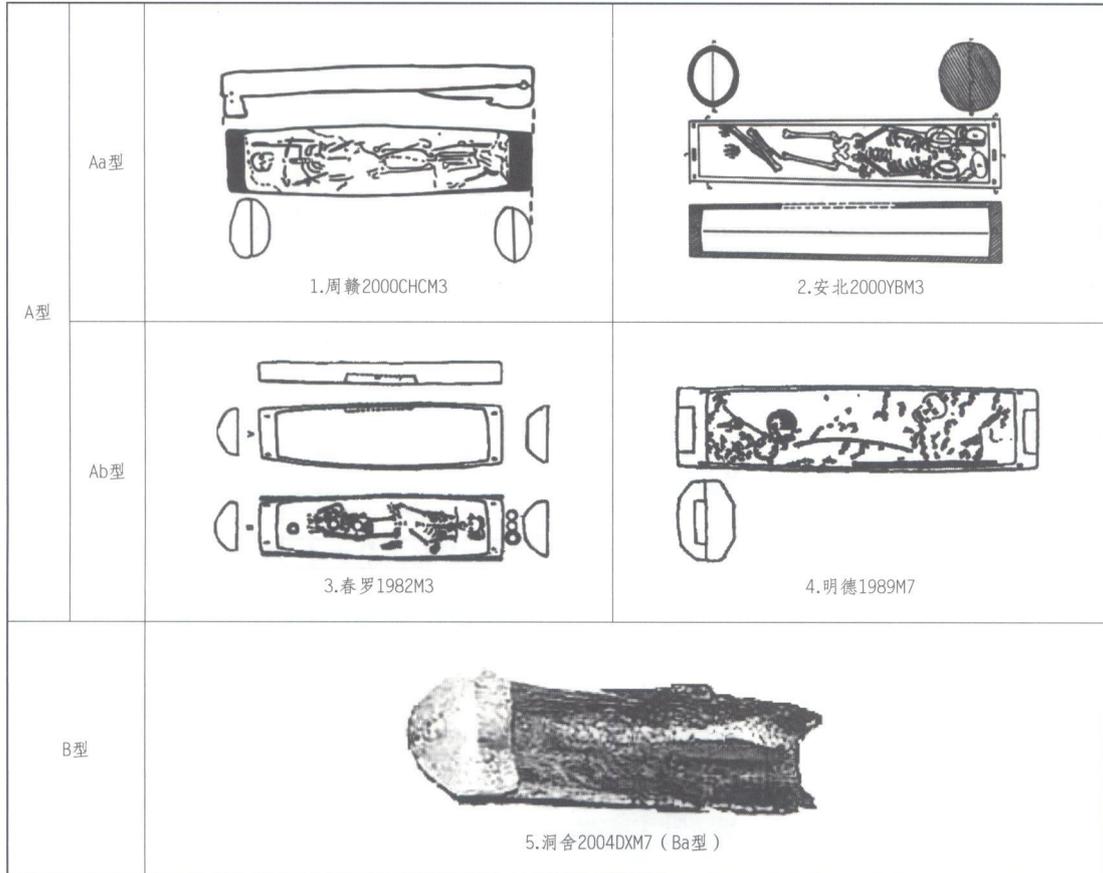
Ab 型：原木外表加工较多，横截面呈六角形、八角形。如春罗 1982M3（图七:3）、

明德 1989M7 (图七:4)。

B型: 原木半挖通, 一端保留原木作为挡板, 一端插立挡板。

Ba型: 挡板无鳌柄。如洞舍 2004DXM7 (图七:5)。

Bb型: 挡板一端有鳌柄。例如慈乐 M1, 大端挖通插立挡板, 小端(尾端)保留原木作为挡板, 外侧有鳌柄。



图七 东山文化甲系统船棺形制示意图

乙系统 原木挖通, 两端插立挡板, 分为四型。

C型: 棺体挡板外侧鳌柄。如春罗 1982M1 (图八:1)。

D型: 棺体挡板外侧有环状鳌柄。墓例出处暂不明<sup>[35]</sup> (图八:2), 棺体挡板外侧各有一个环状鳌柄。

E型: 仅棺体挡板外侧有榫状鳌柄。

Ea型: 两端挡板有榫状鳌柄, 横截面呈椭圆形。如寨山 1999M1 (图八:3), 两端挡板外侧各有两个榫状鳌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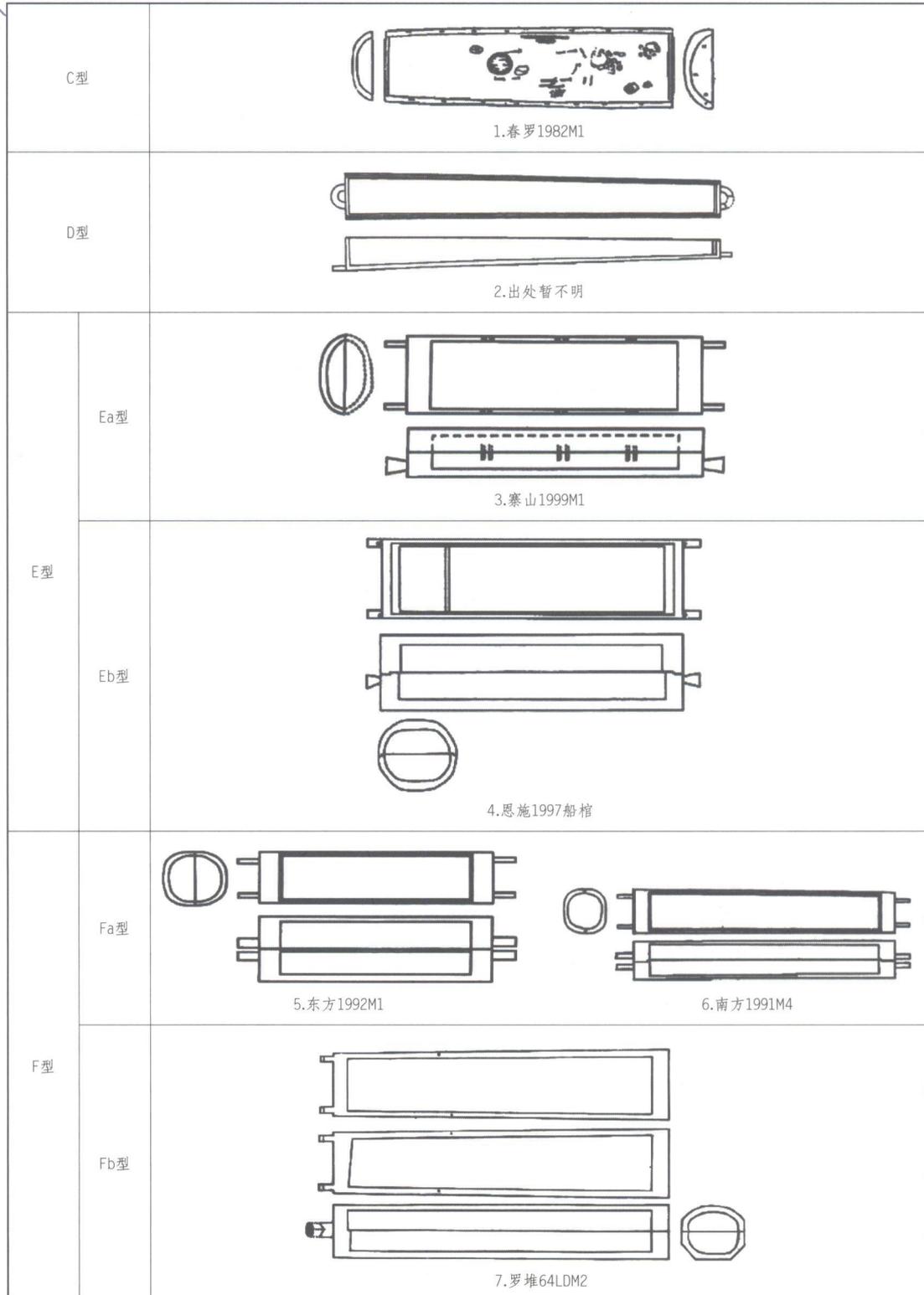
Eb型: 两端挡板有榫状鳌柄, 横截面呈六角形。如恩施 1997 船棺 (图八:4), 两端挡板外侧各有两个榫状鳌柄。

F型: 棺盖、棺室挡板外侧均有榫状鳌柄。

Fa型: 两端挡板外侧有榫状鳌柄, 横截面略呈圆形。如东方 1992M1 (图八:5)、

南方 1991M4 (图八:6), 棺盖、棺室两端挡板外侧各有 2 个榫状鳌柄。

Fb 型: 一端挡板外侧有榫状鳌柄, 横截面近六角形。如罗堆 64LDM2 (图八:7), 棺盖、棺室一端挡板外侧各有 2 个榫状鳌柄。



图八 东山文化乙系统船棺形制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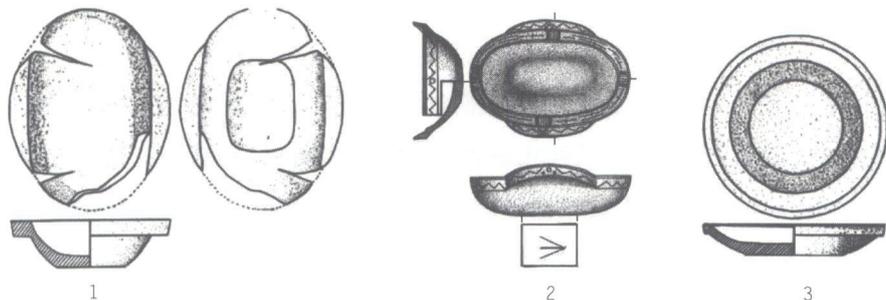
此外, 越南海阳省罗堆、河南省安北、海防省甸城山等墓地见有放置在汉式木椁

内的船棺，随葬器物以东山文化青铜器、陶器为主。杜文宁视为东山船棺葬发展序列的分化形式<sup>[36]</sup>。另外，海防省唐宥砖室墓有木椁结构，椁内放置一具独木棺，随葬品以汉式器物为主，属于汉墓系统的葬具。

### 五、船棺葬分期编年的参考角度

由于类型学研究受到局限，裴维英提出船棺葬分期编年的其他参考角度：第一，根据具有时代指征意义的器物断代；第二，与百越遗存、汉墓等相关材料做横向比较；第三，结合碳-14测年。

钱币、漆器、铁器等可以为分期编年提供宏观框架。在船棺葬中，堆山 M9 出有半两钱，富梁 H1M8 出有西汉五铢，春罗 M3 出有大泉五十，春罗 M1、安慈 M6 及越南恩施等地出有东汉五铢，时代指征意义最明显。“中国式”漆器也有一定数量，如明德 M6、洞舍 2004DXM7、周山、杰尚等地出有漆耳杯 20 余件，周赣 2000M1 出有漆案，安北 M3 出有漆盘等（图九）。岭南地区出土的漆器均不早于秦代，虽然东山文化晚期可能存在本土漆器制作<sup>[37]</sup>，也有学者推测东山船棺葬的漆盘属于战国楚文化因素<sup>[38]</sup>，但是考虑到东山船棺葬出土漆器的工艺、形制及文化因素的传播路径，无论是输入品还是本地产品，年代当不会早于岭南地区。



1、2. 耳杯 3. 盘（1、3. 周赣 2000M1 2. 安北 2000YBM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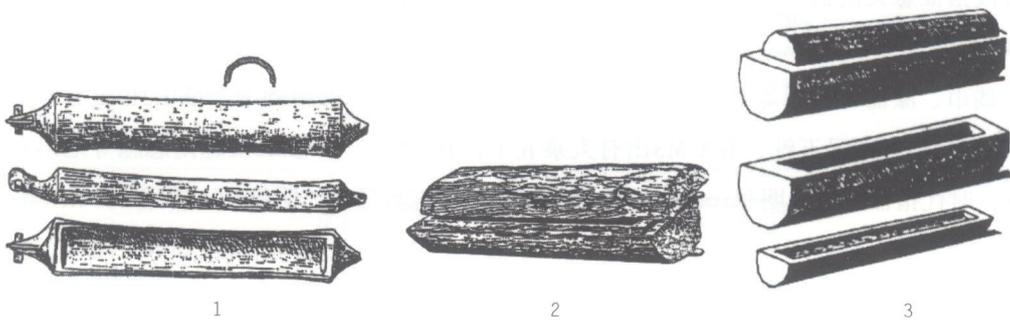
图九 东山文化船棺葬出土漆器

船棺葬出土铁器不多，春罗 M3 出有斧，M4 出有斧、锄，杰尚 M2 出有剑，芳秀船棺出有斧、剑、短剑等。曾经认为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开始生产或者使用从楚地输入的铁器，但是新近研究表明岭南出土铁器遗存的年代均不早于战国时期，“两广现在发现的秦至西汉前期的铁器基本属岭北输入品”<sup>[39]</sup>；而云南完成铁器化进程则是东汉以后的事情<sup>[40]</sup>。

与周邻地区的相关材料进行横向比较，线索较多，不过汉代之前的比较未必可靠。一则就青铜器研究而言，“个别零星出土的器物，由于其标型学相对年代和器物实际流传时间往往不相同，故并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断代的证据”<sup>[41]</sup>；二则对比较对象的认识也不一定到位，如云南元江流域青铜遗存的编年框架仍较粗疏；三则包括民族志材料在内，比较对象多只是局部有相似特征，“以点代面”说服力不强，如东南亚船棺（图

十)、巴蜀船棺的形制与东山船棺还是有较大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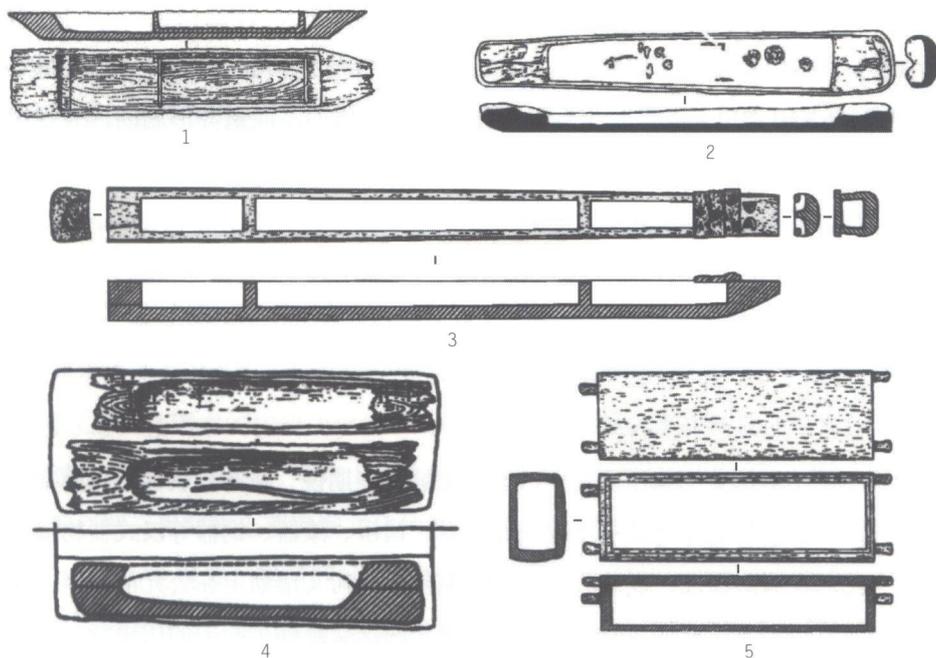
仅供阅读



1. 泰国北碧府翁巴岩洞(Ongbah)船棺 2. 菲律宾巴拉望岛伦坤洞(Lungun Cave)船棺 3. 越南芒族船棺

图十 东南亚船棺示意图

以巴蜀船棺葬为例，巴蜀船棺（图十一）多见首、尾两端或一端上翘，有的一端削尖，两端相当于挡板的部分较宽厚，有的棺室分舱，有的内置小棺（实际是船槨，也可以理解为重棺），有的没有棺盖，有的船棺还有孔洞沟槽结构<sup>[42]</sup>，与东山文化船棺差别较明显。另外，一些船棺形体较大，如四川浦江东北公社 M2 的两具船棺长 7 米余<sup>[43]</sup>，成都商业街 M1、M2 船棺长度均有 10 米余，M18 甚至近 19 米<sup>[44]</sup>；成都商业街还见有船形器物箱。与东山船棺较具相似性的，是陈云洪划分的 B 型巴蜀船棺<sup>[45]</sup>和成都商业街 A 型匣形棺（图十一：4、5）。



1. 昭化宝轮院 M11 2. 什仿城关 M23 3. 成都商业街 M13 4. 浦江东北公社 M2 5. 成都商业街 A 型匣形棺

图十一 巴蜀船棺示意图

汉墓材料的可靠性相对要强得多。罗堆、安北等墓地见有在木槨内放置的船棺，其中罗堆 64LDM2 的木槨类似“井槨”结构，相当于韦伟燕划分的越南汉墓的 B 型木槨（西汉末年至东汉中期）<sup>[46]</sup>；杰尚 M2 的铜匣、明德 M7 的铜槨（原报告称铜鼎）等也

可以在岭南地区汉墓和越南汉墓中找到相似器物。船棺葬的分期编年可以考虑先与汉墓比较，确定出若干年代相对明确的基点船棺葬，如罗堆 64LDM2（船棺形制完整，出有陶釜、陶碗、铜钺、铜矛、铜扁钟、木桨等 20 余件器物，韦伟燕认为年代为东汉中期），然后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在东山文化的年代学框架内纵横穿连，进而建立起船棺葬的分期编年体系。

环境考古亦是分期编年的参考视角。彭长林等指出距今 2700 年海岸线位于越南美德、常信、海阳、东潮一线，“这一界限之外的遗址年代均不超过公元前 5 世纪”；红河低地的东山文化出现于距今约 2500 年，“北面高地的居民大规模南下”至新形成的海退平原，推动东山文化达到鼎盛；“东山文化时期平原演变进程仍很强烈”，广宁、海防等地的船棺葬“都位于现今海岸线附近的低洼稻田的黑色黏土里”；当时居民依靠水路出行，“故死后也用船埋葬”<sup>[47]</sup>。

东山文化船棺葬或许有着不同的发展系统。许多学者曾经认为东山文化从冯原文化系统发展而来，冯原文化、桐荳文化、扞丘文化与东山文化在越南北部地区一脉相承<sup>[48]</sup>，现今则注意到东山文化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多族群、多渠道的融合过程，各类型的文化渊源和发展阶段并不相同，红河类型也不单纯。

船棺葬分布在红河及其支流底江、太平河流域至沿海地带的数十处墓地，出土人骨分属东南亚人种（明德、周山、洞舍）和印尼人种（周贛、春罗）两个类型<sup>[49]</sup>，考古学分区研究或许是有必要的。越南富梁、堆山、洞舍等船棺墓地还见有土坑墓、积石墓、竹编葬、树皮葬、火葬、二次葬，铜器主要出土于船棺葬，范国君因此推测船棺葬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或者较富有<sup>[50]</sup>；红河类型还见有铜容器葬、瓮棺葬。包括船棺葬在内的不同墓葬形制固然表现出等级差别，但也不能排除其中存在文化认同、族群认同的差异，本文划分的甲、乙两个船棺葬系统似不能以前后相继的发展序列来解释。

## 六、从历史背景考察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年代框架

在东山文化船棺葬的分期编年研究中，裴文廉的“三期说”较有代表性（见前文）。依此分期，船棺葬器物最明显的变化是本土青铜器衰退，钱币、漆器、铜器等汉式器物随而增加。考虑到东山文化的发展阶段性，以及红河类型晚期阶段（何文璠划定在公元前 200 年—公元 200 年）持续受到北方势力（秦象郡、蜀王子、南越国、两汉交趾郡）冲击的历史背景，暂不论具体年代、墓例和文化特征，“三期说”可以作为船棺葬分期编年的基础。

越溪 M2 除典型东山文化和受到吴越、百越文化影响的两组青铜器外，受到秦汉文化影响的铜壶、铜簋等宜单独视为一组器物。第 3 组器物与前两组器物年代（春秋末

期至战国晚期偏早阶段)和碳-14测年<sup>[51]</sup>出入较大,确实令人疑惑。寨山、周贛、周山等墓地还有一批落入公元前4世纪的碳-14数据,全部否认也难免武断,不过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早期船棺葬未必能够早至公元前6世纪。

蜀王子南下建立瓯骆国(蒙文通称为“安阳王国”<sup>[52]</sup>)的记述传信传疑,有些学者认为东山文化就是瓯骆国遗存。依陈云洪的观点,巴蜀B型I式船棺的年代为春秋时期,B型II式船棺的年代为战国时期;依发掘报告,成都商业街A型匣形棺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阶段。B型巴蜀船棺方首方尾,两端平齐,横剖面略呈六角形;商业街A型匣形棺(亦属于模仿舟船的棺槨体系<sup>[53]</sup>)挡板外侧有榫状鳌柄,与东山船棺有相似之处。巴蜀船棺葬从西周晚期延续至秦汉之际,年代与东山船棺葬有交集,不排除其间存在交流影响。

瓯骆国若为历史真实,年代宜落实在秦末至西汉前期<sup>[54]</sup>。自秦置象郡、蜀泮建立瓯骆国至赵佗击破安阳王,多种北方文化因素在这段不长的时期内汇聚、渗透至红河平原,具有节点性质。西汉设置交趾三郡(公元前111年)是汉文化大规模涌入红河平原的标志,在东山文化发展过程中最具节点意义。东汉马援征伐二征(公元43年)亦是具有节点意义的事件,交趾地方势力的毁灭意味着东山文化走向衰亡。

作为东山居民社会文化整合的考古学表现,汉墓系统的扩展与船棺葬的衰落一体两面。依韦伟燕的观点,越南汉墓文化因素的构成变化分为三个阶段,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时期以汉文化主体因素为主;东汉早期至东汉中期以汉文化的主体因素和汉文化的岭南地方因素占统治地位,汉文化的越南本土因素有一定比例;东汉晚期至三国初年汉文化的本土因素已经居于主导地位<sup>[55]</sup>。越南汉墓文化因素的构成变化与东山船棺葬文化内涵的渐次转变应当大体同步。

汉墓系统进入红河平原后,与东山文化船棺葬存在一个并行发展阶段,类似于“西汉郡县体制并未立即切断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的发展,西汉郡县的设置与土著青铜文化的整体衰落存在时间差”<sup>[56]</sup>的历史现象。船棺葬的衰落时期相当于韦伟燕划分的越南汉墓第二、第三阶段(东汉早期至三国初年),船棺葬的衰落和越南汉墓本土文化因素的发育,是东山文化与汉文化在红河平原长时间调适互动的最终结果。

船棺葬的分期编年不能脱离东山文化发展的阶段轨迹和历史背景,由于类型学研究基础薄弱,船棺葬的分期编年框架暂且只能是粗线条的。东山文化船棺葬的阶段性变化似以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作为参考时间节点更符合历史背景,就现有认识,船棺葬暂可以划分为三期,早期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战国时期;中期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相当于瓯骆国和西汉交趾郡时期;晚期为公元1世纪至2世纪,相当于东汉交趾郡时期。与何文璠关于红河类型发展阶段的年代框架比较,早期船棺葬属于东山文化典型期,中期、晚期船棺葬属于东山文化晚期。

最后要讲到，虽然居住地“地势较高的东山人没有用船棺埋葬死者的习俗”<sup>[57]</sup>，但是还是有必要考虑“以整木制作的棺具是否均属于船棺”<sup>[58]</sup>。包括东山文化在内，习惯上所说的船棺葬需要分析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其中一些或许只是独木葬而非独木舟葬。

(本文承博士后韦伟燕校对并提出修改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 
- [1] [越南]裴维英:《越南北部东山文化船棺葬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 [2] [越南]何文璠:《越南东山文化》,(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261页。
- [3] [越南]黎文兰、范文耿、阮灵:《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梁志明译,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2,第55页。
- [4] [越南]裴文廉:《越南东山文化船棺葬》,越南百科词典出版社,2013。
- [5] 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藏越溪古墓的一批遗物》,1965。
- [6] [越南]杜文宁:《越南芒族墓葬及越南传统葬式》,《民族学杂志》1977年第4期。
- [7] [越南]范国君:《船棺葬的介绍与评述》,《纪念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成立20周年研讨会》,1978。
- [8] [越南]范国君、黄玉利:《周山船棺葬与河南地区近年所发现船棺葬研究》,《考古学》1981年第2期。
- [9] [丹麦]佩尔·素伦森:《关于杜文宁对船棺葬研究的评议》,《考古学》1981年第2期。
- [10] [越南]裴文廉:《关于越南船棺葬分类研究》,《越南1986年考古新发现》,1986。
- [11] [越南]裴文廉:《越南船棺葬年代问题》,《越南1987年考古新发现》,1987。
- [12] [越南]范国君:《越南墓葬类型的命名问题的初步讨论》,《考古学》1985年第2期。
- [13] [越南]陶贵景:《越南具有树木挖空的棺材墓葬形式的发展过程、年代及起源》,《科学通报》,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1986。
- [14] [越南]潘进波、陶贵景:《越南公元1世纪至10世纪发现的古墓》,越南文化在公元初10世纪会议论文,越南考古学院资料,1986。
- [15] [越南]何文璠:《船、墓与船棺》,《科学通报》,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1994。
- [16] [越南]裴文廉:《越南东山船棺葬》,越南百科词典出版社,2013。
- [17] [越南]何文璠:《船、墓与船棺》,《科学通报》,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1994。
- [18] [越南]郑根:《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所保存的树木挖空式棺材墓葬》,第一届越南船棺研究会议论文,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资料,1982。
- [19] [越南]黄春征:《船型棺材有关若干问题研究》,第一届越南船棺研究会议论文,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资料,1982。
- [20] [越南]裴文廉:《越南东山船棺葬》,越南百科词典出版社,2013,第184页。
- [21] 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考古》1990年第6期。
- [22] 林永昌:《东山文化的若干问题再检讨》,载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第113-136页。
- [23] 李龙章:《楚雄万家坝墓群及万家坝型铜鼓的年代探讨》,《文物》2003年第12期。
- [24] [越南]范明玄:《东山文化的一致性与多样性》,(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25] [越南]何文璠:《船、墓与船棺》,《科学通报》,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1994。
- [26] 郑小炉:《南方青铜器断代的理论与实践》,《考古》2007年第9期。
- [27] 林永昌:《东山文化的若干问题再检讨》,载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1,第113-136页。
- [28] [越南]黎文兰、范文耿、阮灵编著:《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梁志明译,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2,第57页。
- [29] [越南]裴文廉:《越南东山船棺葬》,越南百科词典出版社,2013。
- [30] [德国]雷安迪:《越溪墓葬的再思考——越南发现的汉代船棺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州博物馆编《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6,第508-516页。
- [31] 蒋廷瑜:《镂孔圈足铜壶研究》,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等编《广西与东盟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2。
- [32] 韦伟燕:《东山文化与越文化的关系——以越南海防市越溪二号墓的研究为中心》,《学术探索》2015年第5期。

- [33] 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第302、303页。
- [34] 林沅:《为类型学正名》(代序),载[瑞典]蒙德留斯著《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滕固译,商务印书馆,2019。
- [35] 裴文廉《越南东山文化船棺葬》将该图片属越溪M2,但越溪发掘报告未见,可能有误。
- [36] [越南]杜文宁:《越南芒族墓葬及越南传统葬式》,《民族学杂志》1977年第4期。
- [37] Michèle H. S. Demandt:《越南北部与岭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与产品交易》,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第142-144页。
- [38] 卢智基:《东山文化研究的反思:读范明玄〈东山文化的一致性与多样性〉》,载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
- [39] 李龙章:《两广地区出土战国秦汉铁器辨析(下)》,载深圳博物馆编《深圳文博论丛·二〇一二年》,文物出版社,2012。
- [40]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第318-324页。
- [41] 李龙章:《秦汉象郡辨析》,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446-456页。
- [42] 郑君雷:《巴蜀“船棺葬”——船棺的界定、类型及文化内涵》,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15-225页。
- [4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浦江县文物管理所:《浦江县战国土坑墓》,《文物》1985年第5期。
- [4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文物出版社,2009,第42、60、124页。
- [45] 陈云洪:《四川地区船棺葬的考古学观察》,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5,第241-268页。
- [46] 韦伟燕:《越南境内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60、137-148页。
- [47] 彭长林、付珍:《越南北部古环境变迁对古文化发展的影响》,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5,第157-174页。
- [48] Masanari Nishimura: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from the Palaeolithic to Iron Age in the Red River Plain and the Surrounding,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347-373页。
- [49] [越南]阮邻强:《越南东山文化居民的人种特征》,(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50] [越南]范国君:《古代芒族社会及经济初步探讨》,《考古学》1993年第2期。
- [51] 样本Bln950距今(1950年,下同)2480±100年,样本Bln1227距今2415±100年,样本Bln1249距今2320±100年,碳-14年代分别对应公元前530年、公元前465年和公元前370年。[越南]裴文廉:《越南东山船棺葬》,越南百科词典出版社,2013,第184页。
- [52] 蒙文通:《安阳王杂考》,载《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第63-81页。
- [53] 郑君雷:《巴蜀“船棺葬”——船棺的界定、类型及文化内涵》,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15-225页。
- [54] 郑君雷:《也说“瓯骆联盟”和“瓯骆国”》,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2019,284-292页。
- [55] 韦伟燕:《越南境内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193页。
- [56] 郑君雷:《边远以远:云贵高原“羁縻类型”汉文化形成概略》,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02-218页。
- [57] 彭长林、付珍:《越南北部古环境变迁对古文化发展的影响》,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科学出版社,2015,第157-174页。
- [58] 郑君雷:《巴蜀“船棺葬”——船棺的界定、类型及文化内涵》,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续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15-225页。